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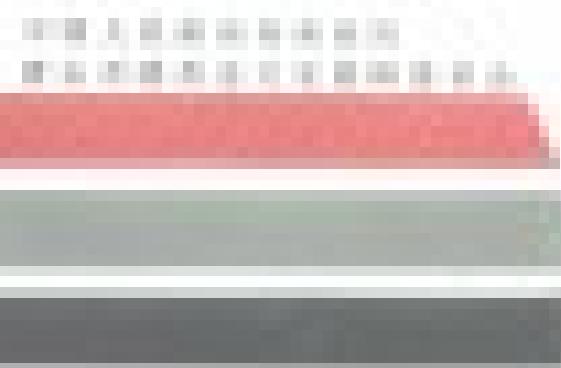
唐山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教育史料之一



唐山 文史 資料



唐山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教育史料专辑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12月

唐山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教育史料专辑之一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98 字数 18.1万 印数 2000册

冀出内刊字 JN—2021

主 编

魏兆环

特邀编辑

王士立

责任编辑

吴 天

编 者 的 话

这辑唐山教育史料专辑之一和明年编印的教育史料专辑之二，主要是收集了解放前唐山百余年的教育史料。大体分为明清、民国、日本侵略、国民党统治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等不同时期的教育史料。其中有各类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有抗日反蒋的学生运动，有李大钊、杨秀峰等革命家的教育实践，有毕生致力于教育的教育家和优秀教师。这里收集的是其中一部分，仅供读者研读。

去年，《唐山文史资料》编印了唐山文化史料专辑之一、之二，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以工业、农业、商业、科技、卫生、民族宗教等专题的史料，将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唐山市近百年的发展概貌。欢迎读者为我们积极提供征集线索、赐稿或给予指导。

目 录

依靠菁苗之青年	开敷青春之中华	
——卓越的革命教育家李大钊同志	李叔兴(1)	
教师的榜样	李欣华(16)	
李大钊与私塾老师	刘荆山(20)	
风范永存天地间	张尔岩 口述 葛辛堡 整理(24)	
 中国第一所高等铁路学府		
——唐山交通大学	王彦鹏 整理(29)	
我的父亲与唐山交大	茅于美(60)	
许元启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唐山交大	王树信 整理(73)	
李鸿斌回忆唐山交大早期学生运动	王树信 整理(78)	
唐山交大学生运动的一些片断	石军 遗作(82)	
 丰润早年教育四题		
丰润早年教育四题	朱友春(87)	
私塾教育见闻录	夏述先(111)	
唐山的书院	王彦鹏 整理(116)	
乐亭县的昔日私人办学	李荣亭(120)	
 半封建半殖民地岁月唐山市区的小学教育		
半封建半殖民地岁月唐山市区的小学教育	桑伯清 整理(134)	

- 刘凯元创办唐山同仁小学..... 刘秉中(144)
“圣若瑟院“与”若瑟小学”..... 桑伯清 整理(155)
开平小学今昔..... 欧阳维(158)
开平小学常樟寰校长日记摘钞..... 赵豁达 郑天民(164)
三屯营国民教育创办史..... 刘禾田(168)
- 李蒸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钟群庄 王士立(172)
回忆父亲——李蒸..... 李筱蒸 李长乐 李溪桥 李梅(182)
回忆李蒸校长..... 肖金平(187)
真知卓见 爱国爱乡——记李蒸先生..... 唐向荣(189)
冀东教改的先驱裴廷楹先生..... 唐向荣(196)
语言学家裴学海..... 刘新文(202)
清末举人刘襄臣..... 兰玉芬(206)
少帅和他的老师..... 李荣亭(215)
- 日寇统治时期的东陵学院..... 陈庆丰 王春青(220)

依靠菁苗之青年，开敷青春之中华

——卓越的革命教育家李大钊同志

李权兴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以观察国家命运和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革命导师。他卓越的革命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至今为人们铭记和广为传颂。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

191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不仅一入北大使之“旌旗变色”，他还想着更多的事情。在家乡办学校也是其中之一。他趁着北大放寒假的机会，回到了故乡乐亭县大黑坨村。这次回家，心里装着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和乡亲们一道利用村西边的庙宇——华严寺办初级小学。

农村的教育问题，李大钊想的很久、很多。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这一观点是李大钊首先提出的。农村的教育要得到普及和发展，办学校是必由之路。可是农民的负担已经很重，大兴土木创办学堂，不是可行的办法。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改造旧庙宇，

创办新学堂这个途径上。

李大钊一到家里就抓紧办这件事情。他把乡亲们请到家里，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充当他们的爪牙，鱼肉百姓。农民要想把这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就一定要有文化，接受现代教育，懂得团结、斗争，谋求解放的道理。要让孩子们从小就上学读书，学习新知识。华严寺里有房有地，只让那么几个泥胎占着宽敞的地方，何不办起学校让孩子们在那里读书识字呢？咱们村先这么办起来，也是给邻近村子领个路。这是件好事情啊！

李大钊的一番话，使得在座的罗泰昌、赵老尊、谷老文、赵焕章、谷有三、杨志轩等人都连连点头。大家议论一阵子，决定立即着手办好这件事。把华严寺大殿改为教室，供学生们上课。把西配房腾出来留给老师住。另外清理出一块香火地给孩子们做运动场。

大黑坨村初等学校就这样诞生了。李大钊请来了宁绍先教男生班，刘静波（女）教女生班。在当时，男老师教男生，女老师教女生，这样的安排乡亲们容易接受。他还作了细致的工作，安排庙里的和尚担任学校的工友，为孩子们烧水喝。男生班、女生班报名都很踊跃。学校举行了热闹的开学典礼。

在学校的大门两旁，有一幅醒目的对联，这是李大钊亲自拟定和书写的：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
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

李大钊每次度假回乡，总是要宣传中国的贫困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剥削压迫造成的，只有让劳苦大众当家做主，改造社会，才能建设新的中国。1923年12月，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受李大钊思想影响较深的北大毕业生王岑伯，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乐亭中学的校长，他是乐亭县王滩村人。1924年1月，李大钊又介绍共产党员王德周（佩环）到乐亭中学任教。在李大

钊的影响下，王岑伯和王德周摒弃了教育局编的语文课本，选用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和参加社会改造。通过纪念“五一”、“五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生中广为传播。一些进步学生提出了“团结奋斗，打倒军阀，拯救中华”的要求。王德周在这年暑假去北京，汇报工作中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批准他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乐亭中学支部，吸收了徐凌汉（运步）、贾坤普（涣生）、李运昌（芳岐）、宋匡我（永萃）葛玉田、孙洪祥、王成奎（此人以后叛变）七名同学为团员。至寒假时，其中年满18岁以上的徐凌汉、贾坤普、葛玉田、王成奎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乐亭中学党支部，由王德周任支部书记。乐亭中学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做到了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1925年7月，葛玉田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8月，李运昌、孙洪祥去了黄埔军校；其他党、团员也先后去了西北军事干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在漫长的艰苦斗争岁月里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切都是与李大钊的关怀分不开的。他曾说过：“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巨”。他告诉人们对发展国民教育，要有战略眼光，“从事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

“劳工补助教育尤其必要”

李大钊说：“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因此，他十分关心劳工的教育问题。

1920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支新生的力量，这就是李大钊直接关心下建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资料，讲演团曾分赴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露天讲演。他们的讲题有：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的害处；怎样做家长；破除迷信；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等等。这是一次广泛的启蒙教育，又是对知识青年接触社会生活实际的引导。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大

学生们亲眼看到：“国民学校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论语》，炕上躺着的却是先生。”他们才真正知道北洋政府教育的许多话是假的。中国真是到了最危险的地步。邓中夏、许德珩、杨钟健、朱自清等都曾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他们从此下定决心，要努力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并为之奋斗终生。

李大钊认为，对劳工还应开展补助教育用较长的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应该创办补习学校。

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正式开学了。这是由铁路工人史文彬等发起的，李大钊对此非常重视，派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前往协助筹备工作。学校开学后，办得很好。工人们有了文化知识，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还出版了《劳动》周刊，每期能售出2000多本。这样一来，许多地方都准备仿照长辛店，也把当地的补习学校建立起来。当时的北京军阀政府交通部深知这样一来，工人思想将更难控制，但若强行制止，势必造成冲突，再三斟酌，遂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学校名称还叫补习学校，但改为官办，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为了把学校教育的实权夺过来，李大钊先后安排了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应聘去职工业余学校当老师。例如，京奉铁路唐山职工业余学校虽然是交通部办的，可是教员李树彝却是李大钊委派去的，他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如何向工人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十分关切。他反复琢磨怎样用工人的语言，形象的比喻，讲明最重要的道理。他亲自到长辛店讲课，指导工作。他组织领导参加讲课的同志把一些革命道理编成歌曲教工人们学唱：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

乌云满天红！”

还有一次，李大钊到郑州去给工人们讲演，他说：“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工’字和‘人’字，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成了‘天’字。”“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吧，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一个好的中国。”

李大钊深知当时中国工人受奴役和悲惨的生活境界。他说：工人的生活不如骡马。他以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状况来算这笔账：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资本家就损失了近一百元。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若是死了，资本家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命还不如骡马的生命。许多工人从他们的经历中受到教育，也就接受了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道理。

在李大钊的正确领导下，北方工人接受了党的思想教育，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图书馆纷纷建立起来。对北方的工人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当时一些主张教育救国的人，认为这不是正规的教育，只是思想鼓动。李大钊向他们解释：“现代教育，不是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刻版的程序去造就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动的人，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象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其必要之必要。”“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农民的愚暗必须脱去”

李大钊早就指出过：“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使农民脱去愚暗，陈说苦痛，谋求解放。

因此，要在实际斗争中教育农民，才能办农会，办学校，从根本上实现农民的觉醒。

1922年李大钊亲自组织领导了京郊菜农反菜捐斗争便是一例。当时北京的封建军阀加紧了对农民的勒索，宣布征收菜捐。李大钊抓住了这一时机，对农民进行了思想发动。农民认为李大钊讲得有理，斗争获胜也有把握，于是采取一致行动。不再进城送菜，也不再进城清理厕所，掏粪积肥。结果，没过上几天，北京城内，新鲜的蔬菜断源，厕所中粪便流溢，城市生活陷入紊乱之中。蛮横的军阀面对此景束手无策，不得不下令取消征收菜捐。斗争的胜利使农民懂得了许多道理。北方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就是在农民夜校培养的骨干中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农民夜校成了启发农民觉悟，学习新知识的重要阵地。

农民们认识到学新知识、懂革命道理如此关系到切身利益，办学校，兴教育，便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北方农村的众多庙宇就是在1922年至1924年间改建为学堂、农校的。

深入思想发动，唤醒了农民的觉悟，北方农运如火如荼的开展，正是农民教育的结果。李大钊以很大精力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开展好这场斗争。玉田、乐亭、遵化、三河、平谷、磁县、泊头等地都掀起了抗捐抗税斗争，农校成了他们进行斗争的议事场所。

1925年3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区委，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农民教育，要求抓住三项工作任务：开办农民学校；培养农民骨干；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这三项任务的核心是农村教育问题首要的是通过教育，使农民觉悟起来。为此要求特别注意“利用农间学校，开办农民补助班。”

1926年2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大学举办党员训练班，李大钊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由于来参加学习的有各县的同志，李大钊便进行调查研究写成了《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这个历史上久待解决的问题，主张耕地农有。这篇讲稿被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列为教材。

也正是在大钊精心指导开展农民教育的同时，党内有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对农民运动却采取了指责和压制的错误态度。他们以为农民的斗争是“反洋人，要真主、迷信”。认为农民不可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李大钊为此，又写出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向党内同志讲明农民教育与农民运动的关系，讲明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身体力行地坚持开展农民教育事业。他深情地说：“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壑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哪里渴待着你们去引导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即使是“三·一八”运动之后，李大钊自身处境极为险恶，他仍毫不放松农民教育工作。先后从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奉天等地区，选派了四十多名农运干部去广州，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养农运骨干。并且在京西农大、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设立了6个农民学校，农民子弟入学读书者有300余人。这些革命的种子撒播开来，使察、热、鲁、晋、冀五省的农民协会有50多个。河南农民协会更是全国闻名，会员多达27万多人，陕西农民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北方农运的高潮。

李大钊深刻地向党内同志们讲明：是落后农业经济反映而形成一种农民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因此对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落后性，不是埋怨他们，而要开发他们，辅助他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落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双肩之上。而且这个任务万不容缓。因为，“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直到今天，人们读到李大钊的这番论述，还会受到深深启迪的。

“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接受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为此多次会见孙中山，在苏联的援助下，办起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李大钊在创办黄埔军校上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李大钊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学习军事，抓军队。他对李运昌说：“去吧，学学军事也好，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在前4期黄埔军校的学员中，李大钊荐引的学员就有50多人。1925年10月，他在中共北方区委建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志去报考黄埔军校，李大钊还亲自主持举办了中共北方区委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个班就设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小礼堂和大教室里，学员约有200多人。其中一批同志就去了黄埔军校学习。我们党著名的军事工作者程子华、刘志丹、周益三、张宗逊、李运昌等同志，都是李大钊选派黄埔军校的。

1925年6月，王若飞在李大钊指示下，借助苏联顾问组的帮助，在国民二军办起了北方联合军校，学员达到2400多名。对提高国民二军基层战斗骨干的素质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有的学员参加了共产党，以后成了党的军事指挥人员。

1925年7月，李大钊向冯玉祥建议，仿效黄埔军校的办法，在北方建立一个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冯玉祥就建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设在张家口，很快考取了700余人。李大钊也向这所学校荐引了不少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多人。为北伐战争培养了骨干力

量。

1927年春，李大钊经过努力，终于使冯玉祥同意创办中山军事学校（时称西北黄埔）。这个学校名义上归国民联军总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标，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小平），政治部组织科长高文敏（克林），总队长许权中等都是共产党员，并且由共产党员高致凯、张汉俊、浪波分担第一、二、三队的大队长。所有的中队、分队指挥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后，陕西渭华起义中及陕北红军的一些将领，多是这座学校培养出来的。

李大钊懂得党要抓军队，要培养军事人才，应借鉴苏联的建军经验，因为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他建议，一方面可以派人去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另一方面应该请苏联政府派顾问团来进行军事教育。1925年5月，苏联顾问团一行30人到了张家口。而先后派往苏联学习的也多达40余人。

那时出境赴苏是有很多困难的，李大钊总是周到细致地把各项工作安排好。1926年8月间，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尚在奉军控制之中，归绥以西才是国民军的范围。去西北军校，从北京到包头，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李大钊就叮嘱他们：“路上不能说是参军，要说去探亲，去做买卖。俩人要相互照应，但坐的位置不能过于亲近，避免敌人怀疑。遇到情况互相援助，……”几十年后，阎兴汉同志回忆起李大钊这番热情关切、细致周到的嘱咐，心情还激动不已。

李运昌是当年经李大钊送去黄埔军校学习的，他深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写出了《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一文，文中说：“他对我们也说的期望和鼓励的话，一直在我们心头，成为鼓舞我们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李大钊的军事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